

矢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华中师范大学张耀灿教授访谈录

本刊记者

张耀灿教授出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历经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旧社会两重天有深切的感受，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并把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与忠诚化为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坚守，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与建设、发展与飞跃，见证了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与跨越式发展。张老师从教50多年来，孜孜不倦，桃李芬芳，宏思精耕，成果丰硕，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设立30周年之际，我们有幸对张老师进行了专访。

本刊记者：张老师，您的成长历经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旧社会两重天有深切的感受，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并把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与忠诚化为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坚守，且在近杖朝之年依然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作为后辈学人，特别想听听您的经历。

张耀灿：在迎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之际，思绪万千，感想颇多。30年来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和中青年学术骨干茁壮成长让我倍感欣慰。从自身的经历、实践和无数事实中我愈益坚信一个道理，即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的热爱是与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高度一致的。我之所以热爱并乐于把一生献给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是因为从切身感受中有着新旧社会



两重天的鲜明对比。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出生之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逃难、躲防空洞等往事深深刻进了童年的记忆。国民党统治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南下逃窜前还大肆炸毁交通设施和工厂，我和许多护厂的工人、市民一样痛恨国民党，盼早日得到解放。我和参加地下党团组织或外围组织的学兄们早就传抄着革命诗歌，早就学会了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那天，我和广大市民在中山大道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1950年元月，还不到十二岁半，读初中一年级，团市工委到学校来建团，鉴于我真诚追求进步，批准我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从此，我在学生时代一直担任团干。初中毕业，我和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一道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师范学校，决心献身教育事业，当一名人民教师。建国初期劳动人民文盲比重很大，后备干部缺乏，中师尚未毕业，武汉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就于1955年1月提前抽

调我到武汉市文教党委组织部工作。年纪小想读书,组织上又支持我考大学,我第一志愿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1956年10月,19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7月又提前毕业留校,在人事处学生科做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部决定在高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修养”课,于是1981年初我被任命为“德育教研室”副主任,参与思想品德课教学和辅导员培训管理。1984年,华中师范学院成为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和第二学士学位生的学校,校党委任命我为政治教育系副系主任,分管科研、研究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工作。1986年被评为副教授,1987年开始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3晋升为教授并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改制为政法学院后,我担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长。1996年与武汉大学联合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成功,成为国内首批招收博士生的导师之一。1997年4月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议组成员,2003年受聘为第五届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获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后,我又开始在华中师范大学招收培养博士生。2006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首批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又首批批准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年4月退休,同时接受学校返聘至今。2014年2月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招收博士生。

本刊记者:您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科研与教学工作,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哪些领域?

张耀灿: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两大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立之初,主干课教材缺乏,在省高校工委支持下,我与朱江教授合作主

编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其征求意见稿在省办内刊《高校德育研究》1984年第2期刊发,便暂用它来作为教材使用。后定书名为《大学德育概论》,1986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于率先建构了大学德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1989年由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光明日报等联合组成的“改革开放十年来教育理论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评选为优秀教育著作。该书突破了当时许多教育学版本关于德育过程“三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社会的思想品德规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较完整的“四要素论”(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后来,根据时代特征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状况,我在1988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同时作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过去教育者所具有的信息优势有所削弱,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还决定着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抉择方向,只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外在因素已不符合实际,应当辩证地看待“内”和“外”,因此,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四体六要素”的观点,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受教主体)、教育介体(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体(环境)构成。这一观点不仅更为精细深入,而且贴近实际,富于时代气息,在教育部思政司召开的基础理论研讨会上得到同行们认同,并写入会议纪要。针对不同看法,我进行了深入论证,撰写了《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重要要素》(《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我认为,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和规律,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规律的前提和基础。为此,首先就要把思想品德结构搞清楚。我发现辅导员在对开展思想政治素质测评时所用指标体系欠全面,随意性大,更觉加紧研究的迫切性。过去,教育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成果均从某一侧面来论述人的思想品德结构,而我们的工作需要对它有一个立体全面的认识,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我提出“三维立体结构”的观点,即认为“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系统是一个由

心理、思想和行为三个子系统及其多种要素按一定方式联结起来、具有稳定倾向性的三维立体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其中，心理是基础因素，表现为知、情、信、意、行这几个心理过程；思想是核心因素，包括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几个基本观念；行为是外显因素，内含动机、目标、行为、效果等要素。反复出现的品德行为才会养成品德行为习惯从而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

本刊记者：一门学科对基本范畴的共识是该学科理论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您怎么认识？

张耀灿：我一直注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曾经撰写《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一文，提出过十对范畴，发表在贵州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办的《思想政治教育》1989年第2期上。开始招收博士生后，指导徐志远以此为题进一步研究，其阶段性成果提出了八个对偶范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收入和徐志远合作的专著、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的最终成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然现在对此问题的研究离完善成熟还有差距，但起到了促进讨论、抛砖引玉的作用。后来，我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重新审视》（《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年第10期）一文中，将基本范畴优化为以下八个，即：思想与行为（起点范畴），教育与受教育者（主体范畴），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客体范畴），内化与外化（过程范畴），个人与社会（终点范畴）。上述认识的优点在于，既有起点范畴又有终点范畴，既有主体范畴又有客体范畴，既有要素范畴又有过程范畴，既有对偶范畴又有最重要的单体范畴。希望引起学界进一步深化研究，以促其早日成熟、完善、稳定。

本刊记者：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前沿问题。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

学化、现代化必须加紧研究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问题，为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服务。为此，1985年在陆庆壬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审稿讨论会上我建议增写“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一章，主编采纳了我的建议。针对大学生思想品德考核评估存在的问题，1989年我在本校学报发表过《关于在高校学生工作中推行量化管理的几个问题》一文。从首届第二学士学位班开始到培养博士生，我都把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作为教学内容和学生毕业论文选题。2008年，经过竞标，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团队获得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测评体系研究”。在主持研究中认识到，高等教育的质量归根到底体现为学生的学习质量，因此要重点测评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收获，并从结果中进行归因分析。针对过去不少测评简单地将学生答卷作为依据，或将对学生的测评与对思想教育的测评分开设计两个指标体系，试图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等欠科学的做法，我们在课题研究中注意改进设计为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和测评卷（A、B卷），每一套测评卷均包含四个方面的项目：学生的基本信息项目（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设计，便于分类作多种比较分析），对某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知识的掌握和分析能力的进步（运用考试学原理与方法设计），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进步变化（运用教育测量、心理测量量表技术设计），归因分析（运用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按影响学生进步的主要因子设计项目，以教育教学因素为主）。测试卷需在课前、课后分别经一定的样本数多次试测、修正，直至信度、效度、科学性均较好为止。以这套测评体系为主导工具，辅之以平时注意收集学生学习质量的各种例证，写出该课程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测报告，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课题顺利通过结项鉴定后，教育部社科司在全国15所高校开展的试用中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本刊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对于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问题，您有哪些认识？

张耀灿：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改革开放条件下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我不但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立开始便设置“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课程，多次组织教师编写教材，坚持开设这门课程，引导学生研究这方面课题，自己也开展研究，撰写了系列论文来剖析社会思潮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比如，撰写了《经济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年12期），与梁建新合作发表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演进的历史透视》（《探索》2005年第5期）、《论加强西方思潮引导的方法论问题》（《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与杨静合作发表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着力点》（《思想理论教育》2007年第10期），等等。还与毕红梅共同承担了教育部社科项目“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发表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要开好“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课程》（《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年第2期）。

本刊记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学界有争鸣，您主张推进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请谈谈您的看法。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全面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我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侧重强调革命事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有的学者将前者称之为“社会哲学范式”，而将后者称之为“人学范式”。在我看来，“社会哲学范式”就是唯物史观指导范式，而且我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也是从属于唯物史观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这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因此我认为，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前提下，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时又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指导。我发表的《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第7期）便是上述思想脉络的产物。“范式”是库恩提出来的，他说的范式的变革是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旧范式的危机，新范式对旧范式的颠覆而推动科学的发展。借鉴库恩“范式”理念时应考虑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点很不一样，社会科学研究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特点较为显著，因此我认为，人学范式是对社会哲学范式继承基础上的超越、深化，是更全面地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后来有学者撰文指出，要慎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在“慎提”主张中也有不同的观点，都对我有启发。特别是有同志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和文明样式是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革命战争年代的研究范式与和平建设年代的研究范式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革，研究范式只是不断地改进完善，不宜将文明样式的不同混同于范式的转换。虽然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但我的文章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也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本刊记者：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需要及时提炼经验，您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视角梳理过。您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有哪些？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注意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推进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揭示和把握客观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为此，我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视角进行了总结。比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表过《二十年学校德育的回顾和思考》（《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998年第5期）、《改革开放30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期）、《建国6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17期）、《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测评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十六大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回顾与瞻望》（《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12期（上））；关于学科建设方面发表过《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现状与发展展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改革开放30年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创建30年的回顾与展望》(《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1期)。我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是:第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第二,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第三,坚持正面教育,大力弘扬主旋律;第四,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业务工作相结合,推进德育与智育等的有机统一;第五,坚持主渠道与多渠道相结合,推进显性德育与隐性德育的有机结合;第六,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作为关键,与时俱进地抓好队伍建设;第七,坚持抓好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支撑;第八,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相结合,推进良性运行长效机制的形成(《新华文摘》2009年第22期)。

在总结经验中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应回避,而要予以正视,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颁布实施五周年工作总结高层论坛上,我作了《化解瓶颈制约 推进科学发展》的发言,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全”育人长效机制在许多高校尚未建立起来等,并针对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对策建议(《北京教育·德育》2010年第4期)。

学科设立30年来,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总结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很强的横向学科。因而,30年的学科建设也是一个自觉开展交叉学科研究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干学科和分支学科不断发展的过程。通过梳理学科建设的成就,我发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发展创新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年第5期),用三个图表分别概括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主干、分支和应用理论研究的领域,对于了解和把握学科建设的边界、明晰理论研究的范围,防止窄化、泛化的倾向具有参考价值。

本刊记者:您从1958年留校工作至今已有56年了,从一名政工干部转做教学科研工作的30余

年,正好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30年。您教书育人,桃李芬芳,笔耕不辍,教研并进,请您介绍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耀灿:我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德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专题研究”、“邓小平理论”,为博士生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专题研究”等课程。招收培养了硕士生50余名、博士生30余名。还在数十所高校受聘为兼职教授。

高等教育要以本科为本,所以我特别重视本科教学改革。1998年获教育部重点教研项目“面向21世纪高师思政本科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总体改革研究”,教改研究最终成果于2001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我和陈万柏教授合作主持的专业主干课“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于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在培养硕士生的初期,深感可供研究生阅读的参考书太少。于是组织导师们撰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徐文良热情支持,将其作为研究会的重点课题立项研究,并建议联合第一批博士点的几位博士生导师合作,以便提高专题研究的质量。该书编写完后,学科创办的决策人、原教育部副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珮云同志欣然应允为书作序,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被各个硕士点、博士点广泛采用,被指定为必读书目和考博主要参考书,2006年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同时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被教育部批准为“十一五”规划国家级高校重点教材,出版了修订本。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也是在统编本科教材基础上按专题研究编写的,被批准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2年获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被学位办批准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出版了修订本。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一书,则是在为博士生开设学位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得到湖北省人民政府专项资助,出

版后也被许多学校广泛采用,2009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优秀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我指导博士生项久雨较早地系统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其博士论文于2002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我主持或合作主持省部级、国家级科研项目14项,主持教学研究或重要教材项目7项;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出版著作12部,主编重要教材17部,主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丛书和博士文库各一套共10部,主编思想政治教育系列教材两套共已出版17部。

本刊记者:50多年来您治学育人最深刻的心得体会有哪些?

张耀灿:第一,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做了20多年的行政工作后转做教学、科研工作,而且长期“双肩挑”,常常有不适应、力不胜任之感。但因为热爱这个事业,所以与时俱进就有强大动力,一天当两天用,白天上课、处理行政事务,晚饭后“第二个工作日”开始了,几乎将所有节假日、业务时间都用来学习、研究、备课。热爱这个事业,必然热爱学生,所以学生来请教,我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和积压,不论是自己任导师的学生还是别的导师的学生,也不论是本校本地的学生还是外校外地的学生,不论是当面交谈还是网上请教,我都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努力为他们释疑、解惑,或对他们的写作提出优化建议。当然,我也从学生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与博士生交往更深感“教学相长”的益处。

第二,志在坚信马列。我认为应当努力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成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摇篮,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此就应该开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中心是学好党的创新理论,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弘扬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优良学风。而教师只有自己坚信马列才能引导

和激励学生坚信马列,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去引导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第三,要倡导开展学术批评。开展学术批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利于学术的繁荣。要勇于开展学术批评,包括自我批评。教育部思政司第一次召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讨会时,我提交的交流论文便是对“思想政治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的提法开展学术批评,指出它将“工作”这一实践活动形态混同于对其开展研究的学问、理论形态。我还对“外界影响思想支配行动……”这一“思想行为规律”提出批评,指出其机械唯物论、环境决定论的弊病,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无法解释同样环境下人们思想、行为的千差万别。当然,学术批评应当对事不对人,应当是同志式的探讨。同时,也应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比如,我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重新审视的论文中便对自己论著中的片面性、不完善之处进行了反思。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推进学科理论的发展、完善。

第四,个人努力与团队协作要紧密结合。在任何工作中,个人努力总是做好工作的基础,然而,许多工作都需要与他人团结合作才能做好。尤其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重大课题,更应增强团队意识,搞好协作攻关。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做人第一”。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在立德树人中更是充当着特殊的重要角色,教师更应“做人第一”,自觉加强师德修养。自己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才会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去影响学生“学会做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诱惑因素多,都在考验人,坚持做人第一、做事第二,便能抵御钱权交易、钱学交易等现象的侵蚀。“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历史的检验!”这是我时刻牢记的座右铭。